



中国文人一向讲究“文德”，讲究“操守”。中国文论鼻祖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第一篇头句话就说：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何哉！”（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）他的意思可解释为，“文德”是与“天地”并存的大事。历代文学史家对于缺乏道德的文人都是贬抑的。“文人无行”遭到诟骂。曾几何时，某些文人对“文德”已没有敬畏之心，变成“笑骂由人，我行我素”了。

“文之为德”大矣

穆俊杰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，报章上对于那些得利而“失节”的文艺评论家进行过批评，说他们“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”，“失去了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”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此风依旧，而且愈演愈烈。目前评论界出现了一些“研讨会专业户”。这些“操盘手”经常“光临”或者“承包”各种作品研讨会，他们根本不好好读作品原著，就大发议论，对作品吹捧一通。有些作家也就拿了这些所谓“国家级评论家”的虎皮作大旗，到处吓唬人，似乎这些人的评论，就是国家就是党对作品的“钦定”了。作家也由此得了奖，分了房，甚至升了官，当了什么“代表”。评论家“失德”，作家们就“有得”。得的实惠大了去了！

近来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“金缕玉衣”事件更令人触目惊心！由于一些文

物专家对所谓“国宝”——金缕玉衣出示的“鉴定证明”，被骗子骗走了十个亿，使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。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那些掌握“财权”的官员是怎样失责，怎样不守规则，让骗子骗走十个亿的责任。这里单就那些“顶级专家”有失公德的“失节”行为，说几句话。应该说，那些文物鉴定的“顶级专家”不是没有资质的江湖骗子，他们对于文物的真伪，对于被鉴定的实体，应该是具有识别能力的，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上“走火入魔”呢？恐怕是利益驱动，被那丰厚的“车马费”弄得“鬼迷心窍”了！专家们本应知道，“金缕玉衣”是国宝级文物，全国没有几件，此公说他拥有两件你就相信了。作为有话语权的顶级专家，只隔着玻璃看了几眼，你就敢出示价值24亿的鉴定证明呢？要知道，手握钱财审批权是掌权，掌握话语权也是掌权，掌权就要为民兴利，就要公平、公正。你作为专家，胡乱使用“话语权”，也应当感到内疚和自愧啊！

还是回到“文德”上来。中国文人历来主张文章与德行并重。魏晋时期的文学家葛洪就说过：“文章之与德行，犹十尺之与一文，谓为余事，未之前闻。……”我们今天，经济大潮使许多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，但是我想，文人重文德，重视“节操”，这个传统恐怕还是要继承的！

淳子讲，伊外婆是旗人，骨骼是慈禧那一路的，瘦得有些坚硬。依着这个话路子端详淳子，便懂得了伊饱满的容颜，自有邈远深邃的根底。而伊行事为文的披荆斩棘一路到底，于上海女子的温婉柔腻中，撕开一线锐利而来，便也是极有来由的了。

淳子讲，伊顶顶写上海，顶顶写上海女人，想来必是肺腑之言。偏偏一写已是漠漠二十年，从轻熟写至老熟，无论笔致抑或情致。翻淳子的书，漫卷尽是海上繁花，胭脂点点，那些苍苍岁月里，曾经名动四海的上海女子，一个个在伊笔下活色生香，细

漫卷尽是海上繁花

石磊

细读过去，竟是连体温犹尚存，一颦一笑均是3D的。淳子讲，那是因为和她们的亲。这种亲，大约总是肉里亲，旁人如何用力，总是不成的。

事到如今，能写一笔爱玲文章，甚至笔法精致到乱真地步的，草草算算，海内外恐怕也只有两三人，真也不算如何稀奇。倒是淳子那种，于冬日午后，端坐爱玲家的客厅里，稀薄的旧底子上，闻着水仙的味道、腊梅的

味道以及英国茶的味道。忽然的，来了害怕，害怕那房子拆了，爱玲就永远回不来了。那么彻骨一个冰寒，就把人惊醒了。女子文章，看似不怎么锋利，其实狠得厉害，一刀见血，剑剑封喉。恐怕男子亦未必及得上。

淳子是格外擅长这个的，写字如此，说话亦是。好好吃着饭，云淡风清家常荤素八卦着，偏伊夹生夹熟夹两旬狠的，比如从

前男人娶妻，再浑，总也知道捡好人家女子娶回去，论到娶妾，才向戏子丛中问津。而如今的男人，啧啧，干脆就直接拿戏子当什么什么捧回去了。一边吃，一边便咬牙切齿地笑，一边笑，一边还瞄隔壁桌子的得意饭菜，眼观六路，嘴吃八方，格局真是纵横开扬。我是一向钟意刻薄女子，越刻薄越妩媚。而淳子天赋浑厚，一张尖刻刻的嘴，绝配一副甜甜温软的嗓音，不紧不慢一句一句，咀嚼起来真真别具滋味的说。

淳子写海上胭脂，渐渐写到一个境界，伊讲，那是读城的一种方式。话给伊讲到这个地步，便另是一片天地了。想想上海是何其难懂的一座华城，人在其中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，外头风雨琳琅，漫山遍野都是今天、昨天以及前天。

而淳子终于在某一日心愿得逞，从宋以朗手里求得《小团圆》手稿的复印全本，并附尹文美温馨签名照，伊喜不自胜抱着14公斤的书，步步生莲走在下山路上。我只乱想，彼时彼刻，淳子姐姐的脚上，是否亦踏着一双龙飞凤舞的平金绣花鞋？



遗憾的淹城之淹

俞天白

这次到华东疗养院小住，主管部门组织我们到常州一日游。我之兴奋，无异于增加了一份精神疗养。十二年前，我曾游览常州，这个历来因“文人甲天下”而闻名于世，并因水陆交通的“三吴襟带之邦，百越舟车之会”而获得经济重镇美誉的名城，给我印象实在太太好了。一大早起来写东西的习惯，使我上车不久就睡着了。忽然醒来，满眼高楼大厦，迷迷糊糊的，以为是在上海。得知已经到常州城内，便张大双



至道
杨东建篆刻

从10月份开始，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所属的当代上海研究所领薪水了。这是我的第三次转岗：第一次从市“文联”转到“今日上海”杂志社，完成了从休闲杂志到宣传口舌的转变；第二次从“今日上海”杂志社转到世博局，角色变成了政府官员性质的项目管理人；现在转到上海世博会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任职，参与编纂《上海世博会志》，角色已然成为史书编者。

看起来，这次转岗也无甚稀奇，但深究起来，非同小可。我说的不是任庶常吉士之事，而是从原先的世博会申办、筹办、举办到编纂《上海世博会志》这一工作。此前，是要大张旗鼓开展宣传、造势，要广而告之，提高世博会的知晓度、关注度和参与度，知道的人多多益善。尤其是世博会举办期间，忙得脚不点地，只有上班时间，没有下班时间，那叫一个高强度、快节奏。因此，基本是热运转有余，而冷思考不足，用时髦的话说就是“灵魂跟不上脚步”。而今天的工作性

石柱，花期是否依旧？文笔塔啊，苏学士隐于诗中的“死秃”的雅谑，是否仍然回响在寺院？毗陵驿边的粼粼水波啊，是否照样看得到悟透了人生的贾宝玉的身影？……

是的，留在我记忆中的这几处景点，都蕴藏着一个隽永优美的故事或传说，构成了常州之所以是“文人甲天下”的文化重镇的因素。红梅阁，是始建于唐昭宗年间的古寺，园内的红梅，与阁前那一株会开花的石柱，以及和它相关的传说，展现出撼天动地、使木石也产生了灵性的，不是神，不是佛，而是将他人与自身置于同样平等的地位上，加以理解与关爱的那一份精神。至于发生于文笔塔下，高吟“大江东去”的苏学士和钦禅大师，共同演绎出那幕人生喜剧，则让大和尚头上的那圈佛光，同大文豪头上的那道灵光，一起消失了，展现于世的，是两个活生生的原生状态的人！他们可触可摸，可亲可近的喜怒哀乐，鲜活地让我们产生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阑珊处”的人生顿悟。而毗陵驿，一个沾染了历史风尘的老码头，让人在这个雅与俗、俗与天然交织的世界里，发现它正是蔑视功名富贵的风流才子向凡俗告别的最佳场所，不能不信，贾宝玉真的是在这儿向尘俗告别的！我们将生离死别的这一幕安排在这儿，如梦如幻，似人似仙，原来，只有选择这一处，才能产生虚与实、人与神之间的艺术效果！……可如今，货真价实的文化遗址，却都给淹城“淹”没了。

我不能不感叹，金钱就是如此绑架了文化！我不反对借古迹“搭”台，演一出改善民生的春秋大戏。2700余年的春秋淹城，也真是历史馈赠给常州人民的珍贵遗产。如果搭了这个舞台，是为了让从红梅阁、文笔塔到瞿秋白等文化资源，都能

转岗

宋仲琤

质要求我们坐下来、静下心来坐冷板凳，受得了清贫，耐得住寂寞，全面收集、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资料，科学、合理设置篇目，使《上海世博会志》“全面、客观、准确、权威”记录世博会，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大事件志，以不辱“以《上海世博

会志》的编纂带动上海市第二轮修志工作”的使命。我琢磨着，这个工作应该是“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；细一点，再细一点；准一点，再准一点”，非如此，便与这项工作的性质有悖，便做不好这项工作。然而，关键的问题是，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。按照计划，2012年底前必须完成初稿，2013年编纂办公室组织分纂、总纂，之后交付出版。因此，细仍要细，准必须准，但慢却不能慢，这是一对矛盾。如何妥善处理，对于《世博会志》编纂人员是个极大的考验，尤其是考验管理

名医进社区

(油画)
吴介平



那人却在阑珊处”的人生顿悟。而毗陵驿，一个沾染了历史风尘的老码头，让人在这个雅与俗、俗与天然交织的世界里，发现它正是蔑视功名富贵的风流才子向凡俗告别的最佳场所，不能不信，贾宝玉真的是在这儿向尘俗告别的！我们将生离死别的这一幕安排在这儿，如梦如幻，似人似仙，原来，只有选择这一处，才能产生虚与实、人与神之间的艺术效果！……可如今，货真价实的文化遗址，却都给淹城“淹”没了。

我不能不感叹，金钱就是如此绑架了文化！我不反对借古迹“搭”台，演一出改善民生的春秋大戏。2700余年的春秋淹城，也真是历史馈赠给常州人民的珍贵遗产。如果搭了这个舞台，是为了让从红梅阁、文笔塔到瞿秋白等文化资源，都能

更好地获得发掘与显现，那么，将会帮这个城市增添何等贵重的文化厚度、赋予何等深远的文明内涵啊！中国，文化强国的步伐，必定要快得多！但愿，常州，以及中国其他城镇的下一步，会打消我这份遗憾。

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。作为新到岗的老同志，我是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生怕由于我的失误耽误此项工作的大局，影响世博会志的质量和工期。那样的话，罪莫大矣。

所以，我仍然保持了在世博局工作时的习惯，早早就到办公室，利用早到的一个多小时从事专业学习，提高业务水平，尽可能以最快速度进入角色，投入工作。好在我前几次的转岗为我积累了经验，使我这次的转岗不至于太突兀和生硬。截至目前，“世博会志”各承编和参编单位人员业务培训已经结束，各小组也已组成了编纂工作指导小组，全面开展工作。

古时的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（这和世博会志的编纂时间巧合），三年后，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院，授编修或检讨，正式成为翰林。我呢，就不进翰林院了。人生难得修一志，我就踏踏实实当我的编修，全力以赴修好“世博会志”吧。

莫愁湖
沈善钧

莫愁湖

沈善钧

为爱湖名唤莫愁，寻幽先此作淹留。不嫌菖蒲西凤晚，刚到天凉是好秋。

在上海衡山路、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花园别墅住宅，大多为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、名流学者、民族工商业者乃至爱国志士在此居住。这些“梧桐树后的老房子”不仅仅是上海的，也是见证中国历史的“活化石”。在武康路口、湖南路“湖南别墅”围墙北侧的一栋小洋房内，曾居住过一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坛、学界享有盛名的大家郑振铎先生。

郑振铎（1898-1958）福建长乐人，现代作家、文学史家、考古学家。抗战期间，他在上海坚持抗日救亡活动。曾任文化部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局长等职。他在历史学、文物考古学、文献学、艺术史学、民俗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，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
郑振铎旧居的发现，是个偶然的机会。2000年10月，中国文物学会、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沪考察，在谈到建立现代文学家文库时，认为郑振铎于二十世纪40年代在上海工作多年，对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很大。并对其在沪的旧居表示关切。徐汇区文广办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迅速展开旧居寻访工作。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（著有《郑振铎论》等书）提供相关资料，《郑振铎文集》第三卷《蛰居散记》中记录郑振铎于1942-1945年居住在上海的自述：“一年后在友人的帮助下，搬至居尔典路（今湖南路）的一条偏僻的小巷（今高邮路5弄）内，住在小洋楼的二楼，有两间房，分作卧室和书房。一大片窗是朝南的，一大片窗是朝东的，推开窗口，满眼的绿色。我的书桌，放在南窗下面。有一天早上，房东同我说，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，望着这特高的围墙，我问道，这究竟是谁的住宅？房东说，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，这是周佛海的新居”。根据书中的环境描述，找到小洋房的主人高文殊，高女士介绍：郑振铎与高家系亲戚关系，父亲高振常的堂妹高君箴嫁给郑

振铎为妻，他们关系密切。40年代，郑振铎在上海工作期间，曾在此避难。

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先生获知其父在上海的旧居被查到后，异常兴奋，12月22日，郑先生携夫人从北京来到上海，在陈福康教授、区文管办人员的陪同下，察看其父旧居。郑先生望着当年父亲居住的地方，回忆起小时候的印象，旧居前那一幢别墅有特别高的墙，墙上装着铁丝网，当年从对面厨房喷出大量煤烟，弄得郑振铎不敢开窗的那个窗口，如今墙上窗口已用砖头砌上，但旧窗痕迹依旧等特征。连称此地貌依旧，确认是其父亲当年居住的地方。

郑振铎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。20世纪20年代，他与茅盾、叶圣陶等文化名人在上海开创我国现代最大的新文学社团“文学研究会”。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他邀叶圣陶、胡愈之等成立“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”，创办《公理日报》，揭露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。1935年，郑振铎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，开始对《世界文库》的筹划和主编工作。抗日战争爆发，上海成立“文艺界救亡协会”，他曾担任大会主席，积极投身爱国斗争。在“孤岛”上海秘密发起文献保存同志会，甚至潜伏在大汉奸周佛海私邸附近，积极抢救和收购图书文献资料，为保卫祖国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郑振铎旧居于高邮路5弄25号，建于1935年。二层混合建筑，坐西朝东，白色糙面水泥墙，双坡顶。1942至1945年在此居住。2002年12月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徐汇区人民政府共同举行纪念郑振铎诞辰104周年暨郑振铎旧居揭牌仪式。2007年，徐汇区文化局将其公布为区

记不可移动文物。
沪上名宅



明请读一篇
《吴国桢及其住宅》。